

中国古代金银器物设计的发展历史

邓 昶, 张蓓佳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从原始社会末期至魏晋南北朝, 金银主要是作为饰品和货币, 少有用来制作器皿。进入隋唐以后, 西方金银器物的大量输入, 使得金银被广泛制作成器物, 金银器物设计得到高度发展。宋代开始, 金银器物世俗化、商品化的现象十分突出, 因而在设计上表现出轻巧玲珑、典雅秀丽等风格特点。元明清时期, 在金银器的制作方面, 官府有专门的作坊, 民间也出现了一些“冶金”“治银”的名家高手, 金银器物的设计与制作相当繁荣。梳理中国古代金银器物的发展演变过程, 不难发现, 中国古代金银器物的发展是逐步从小件饰品向器皿演变的, 中国古代金银器物设计艺术在本土文化艺术的影响下产生并发展, 同时在吸收域外设计艺术的情况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 金银器物; 小件饰品; 器皿; 域外设计艺术; 本土文化

中图分类号: J11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1)02-0060-05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Gold and Silver Utensils Design

Deng Chang, Zhang Beijia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the primitive society to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gold and silver were mainly used as jewelry and money, few used to make utensils. After ente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 large number of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were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us gave rise to the fact that gold and silver were widely used for making wares. The designs of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were highly developed. Beginning in the Song dynasty, gold and silver implements features to be light, exquisite, elegant and beautiful on account of their secular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overnment officials had specialized workshops in terms of gold and silver production, and masters skillful in professional gold and silver smelting appeared in the folk. Gold and silver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utensils were quite prosperou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utensils of gold and silver are gradually evolved from small pieces of jewelry to ware, it emerged and develop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ocal culture, while formed a uniqu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absorption of foreign design.

Key words: gold and silver utensils; small pieces of jewelry; wares; foreign design; local culture

金银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青睐, 它们不但被人们用来制作成饰品、器皿, 充当货币, 而且还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金银矿藏量少, 产量小, 以其稀有而彰

显珍贵; 另一方面在于其除了亮丽的色彩外, 还具有如延展性、可锻性、抗腐性等属性, 便于制造各种精美的器物。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金银很早就为人们所利用。

收稿日期: 2010-12-29

作者简介: 邓 昶 (1986-), 男, 湖南宁乡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艺术历史与文化,

E-mail: dengchang125168@126.com

1 金银器物设计的萌芽——原始社会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古代最早被发现和利用的是黄金(在甘肃玉门火烧沟夏墓发现了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黄金制品——金耳环^[1]);而对银的利用则迟至春秋时期(如这一时期常见的错金银青铜器)。最早的银制品则更晚,到战国末才有出现(如解放前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银匱和河南洛阳金村周墓出土的银盒、银卮、银杯等)。从黄金和白银的提炼难易程度来说,银的提炼难度要比黄金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黄金的利用要比银早。

从原始社会末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都主要是被用作饰品,用作器皿的则极为少见。据目前考古所出土的金银制品来看,商、西周以前主要是金臂钏、金耳环、金笄等金制饰品。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金属工艺上鎏金、鎏银及错金银等技术的出现和盛行,所以除具有商、西周时期流行的饰品种类外,又出现并盛行用于青铜器装饰和车马附饰的金银制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金银器皿的制作,如湖北省随州市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出土了1件金盞、1件金杯和1件器盖等。金银器皿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金银制作工艺的进步,但是由于这一时期金银器皿的造型多仿青铜器,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造型体系,因而仍处于起步阶段。秦汉魏晋时期,银制饰品较春秋战国时期增多,开始出现了银扣、银环等饰品。尽管这一时期不乏金银饰品,然而与先秦时期相比,并没有新的造型;金银器皿的制作虽然总体来说缺乏创新,造型也多为银盘、银匱等,但还是出现了银盒、银盆这样的新种类^[2]。

此外,汉魏金银也多用于制作古籍中所提到的“金人”,或东汉以后文献中所记载的“金像”,而少有用来作器物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翻检汉魏文献,其中关于“金人”和“金像”的记载也多不胜数,《后汉书·西域传》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行钟,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诸如此类的记载在《魏书》《洛阳伽蓝记》《高僧传》等文献中也有许多。如此众多关于“金人”“金像”的记载,是否为真金所铸?我国先秦古籍中多将“铜”与“金”混淆,如《管子·匡君·小匡》中言:“美金以铸剑戟……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櫛……”《淮南子·汜论训》载:“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铸金而为刃……”此2条文献中所提及的“金”,很有可能为铜,因为目

前考古所出土的先秦兵器均为青铜所制。此外,从汉魏之际的金属佛像多为鎏金铜佛像等事实来看,汉魏文献中大量关于金的记载也应是铜或者鎏金铜^[3]。

汉代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金”的记载较多,如《史记·平准书》记载“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书·王莽传》中记载:王莽时代结束时,“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匱,尚有六十匱,黄门、约盾、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匱”。在汉代,黄金似乎是寻常之物,然而与文献记载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汉代出土文物所发现的金银器物极为罕见,以致学术界有“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说。《宋史·杜镐传》中记:“(太宗)又问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镐曰:当是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稽诸佛教造像多为铜而非金的事实表明,黄金的消失可能与佛事有关。考古出土的汉代金银器物,多为金印类的小件制品,金质器皿尚未发现,所发现的银质器物也只有区区几件。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墓随葬坑中出土3件银盘和1件银盒,其中银盒似豆形,弧形盖,子母口曲腹高圈足,喇叭形铜座,盖上饰有三个铜兽钮,盒身外壁和器盖上均饰凸花瓣形纹。这一类型的银器在我国广州西汉南越王和云南晋宁石寨的西汉滇国墓中也有发现。在我国,凸瓣形纹饰银器独见这几例,难以划分到我国自身的器物装饰发展序列,但它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以及后来的安息王朝的金银器上却很常见,所以这几例个案银质器物应为来自古伊朗的舶来品^[4]。域外金银器的输入,为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魏晋金银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隋唐时期金银器制作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金银少用于制作器物的根本原因是金银开采、冶炼不易,产量少。据《山海经》记载,战国时期黄金产地有31处,银山22处。金银产地主要为今河南、湖北、山西、陕西南部,四川、湖南、江西北部,以及山东和甘肃少量地区^[5]。上述产地主要集中在中国中部偏南,其中最多的是楚国地域。《汉非于·内储说上》亦记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荆南为楚国南部,这里的丽水即金沙江,直至清代,丽水两岸仍然是云南重要的金矿之一^[6]。尽管当时发现了大量的金银产地,但由于受技术的限制,开采量并不大。

而从汉代开始,金银器物逐渐增多,一方面是由于金银的产量逐步增大,金的产地不断被发现。如章郡都阳县有黄金开采;桂阳郡设有金官,兼采银矿;丹章有金铜之山;汝汉有沙金。东汉时期的金银产地多在今云南、四川两省境内。《后汉书·郡国志》记载:

永昌郡“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华阳国志》记载：“涪水所出，有金银矿。”另一方面，武帝时李少君提出金银可养生的观点，随后这一观念得以流行，这使得金银用于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方面有了思想基础。到唐代，道教大盛，并一度被定为国教，道教养生文化甚嚣尘上，以至金银被广泛作为食器。

2 金银器物设计的高度发展——隋唐时期

进入隋唐以后，金银广泛被制作器物。目前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金银器皿已上千件，其中大宗出土的就有好几批，江苏丹徒丁卯桥容藏一次就出土了956件金器。除了金银器产量增大以外，在唐代文献中还出现了多处前代文献中所未记载的金银矿。《新唐书·食货志》云：“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太平寰宇记》记：“本饶州乐平之地，有银山，出银及铜。总章二年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囚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唐代金银制作，分官、私两种形式。官作为中尚方署下设的金银作坊院；私作又称“行作”，为民营的金银行、金银铺^[7]。这些文献记载和出土的实物资料都充分反映出金银器制作在唐代高度发展的状况。

在隋唐时期，金银广泛被制作成器物的诱因，应该是当时（或者说从北朝后期开始）西方金银器的大量输入。夏鼐先生曾指出：金银器到唐代才发达“可能是受到了萨珊朝金银器工艺的影响”^{[8]729}。西方金银器的大量输入，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造物观念，另一方面则促使人们把传统的金属加工工艺用于制作金银器物。

隋唐的金银器设计和制作大致经历了如下过程：输入——模仿——吸收和中国化。隋唐金银器皿制作在完成中国化过程的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古代设计艺术的第3次飞跃。8世纪中叶前为输入、模仿期，正如夏鼐先生所言：“在唐朝以前，萨珊朝波斯的金银容器便输入中国，到了唐朝初期输入更多，同时中国的金银匠人也模仿制作。”^{[8]77}在陕西何家村出土的“飞狮六出石榴花结纹银盒”和“凤鸟翼鹿纹银盒”，盒盖上的翼狮及翼鹿纹饰，就属于萨珊式的纹样，而这类装饰在唐代并不常见，只出现在8世纪的几件器物上，应是受萨珊波斯器物饰样影响的产物。就器型而言，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传统形中少见的高足杯、带把杯、多曲长杯。其装饰纹样盛行忍冬纹、缠枝纹、葡萄纹、联珠纹、宝相花纹、卷云纹、云曲纹等。花纹纤细茂密，多用满地装饰的手法，流行珍珠地纹。这一时期既是唐代金银器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外来文

化影响最为强烈的时期。而从8世纪中叶到8世纪末，金银器表现出吸收域外特色并走向中国化的风格特征。唐工匠人在外来金银工艺的启示下，结合中国传统的制金工艺，创造出了具中国风格的作品。如各种样式壶的出现，葵花形的盘、盒开始流行，各种器皿的平面多做成四、五曲花形。传统的宝相花纹仍可见到，折枝纹、团花纹开始兴起。这些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既不见于西方器物，也少见于中国传统器物，完全是一些创新作品，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了宋代乃至明清的金银器皿的制作中。这不仅反映着金银器已摆脱了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完成了中国化，且表明了通过对外来金银器造型与装饰风格的撷取，我国的传统造型与装饰艺术开始向着更加多样化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金银器主要在上层社会使用，特别是在宫廷流行，因此在造型、装饰等方面体现出皇家风范。《唐律疏议》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这一记载充分体现了当时金银器在宫廷中的流行和占有程度。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美人首饰王侯印”的诗句可以佐证。与此相关，在出土的众多唐代金银器中，也反映了这一情况。法门寺金银器主要是晚唐时期懿宗和僖宗的供奉物，据器上所刻的铭文及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大多为内廷文思院的制品。除此之外，在唐代还盛行进奉金银器的现象。这在唐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旧唐书·齐映传》载：“映常以顷为相辅，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掎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诞日端午，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地方官员为获得皇帝的宠爱争相进奉金银器物的史实，在《资治通鉴》《唐会要》《新唐书》等书中也有记载。除文献记载外，在近代出土的诸多金银器上所刻的铭文也得到了印证。如西安市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双凤纹大银盘盘底刻有铭文：“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当时皇家贵族对金银器的喜爱和对奢靡生活的追求。

3 金银器物设计的世俗化与商品化——宋元明清时期

从宋代开始，随着金产量的稳定和银产量的增长，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阶级关系——租佃关系的确立，金银器的制造和使用发生了变化，金银器世俗化、商品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并表现出轻巧玲珑、典雅秀丽等风格特点。

这一时期的金银器除上层贵族可以拥有以外，社

会的富裕阶层都可以拥有,民间也大量制造。目前出土的诸多金银器上或刻有打造者或使用者的姓名,如四川德阳出土银器上刻有“孝泉周家打造”、“庞家造洛阳子昌”;或刻有商铺的名称,如湖北蕲春县罗州城材金器上的“王七郎铺记”“邓七铺记”等;又或为供奉者姓名,如河北定州内静志寺遗址塔基的鎏金银净瓶上的“张氏、李氏、刘氏、十王氏、催氏、梁氏、张氏、樊吴三,弟子愿生生供养”等。关于金银器的商品化,宋人的笔记中时有记载,如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载:“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金银器的世俗化和商品化,使得金银器更加生活化。总体而言,器体比例均衡,装饰纹样形象逼真,富有长寿、健康等寓意,无娇柔造作之弊,给人以恬静舒畅的审美感受。如德阳孝泉镇窖藏银器有梅瓶、执壶、尊、茶托、茶杯、楼空盒等,器形工整,与宋代瓷器、漆器的风格颇为一致^{[6]59}。总而言之,宋代金银器制作工匠,力图使造型和纹饰有机结合,和谐统一,以满足社会化、生活化的要求,开创了金银器轻巧、写实的风格。

与两宋同时的辽、金两个民族政权,金银器也颇为丰富,尤以辽代居多。据目前考古资料显示,迄今为止,在内蒙古、辽宁、河北、吉林以及北京等地,发现了不下30处辽墓葬及辽代窖藏,从中出土了几百件辽代金银制品^[9]。而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在会宁俯遗址及周边城址、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金代金银器,有金碗、银壶、银碗、银香炉等^[10]。辽金时代金银器的发展,根本原因是受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金银器制作的影响。据学者考证,北方草原早期的金银器从工艺上讲,许多新出现的技法都是从西方传入的^[11]。再加上这些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对财富的占有欲,使得金银等代表身份、地位的器物成为他们千方百计想占有之物。

元代金银器十分普遍,如安徽合肥出土的窖藏金银器有盒、碟、杯、壶、碗、瓶等100余件,此外,在上海、江苏、山西等地还有出土。一方面少数民族有喜爱金属器物的传统;另一方面元朝3次西征,掳掠了大量的金银器物,俘获了众多金银器制作工匠。据白寿彝《中国通史》卷八《元时期》(上册)中统计:“成吉思汗西征攻陷讹答刺、撒麻耳干、马鲁等城池时,俘虏了大批能工巧匠,其中仅撒麻耳干一地就获‘有手艺的工匠’三万。……窝阔台经略金地时,金朝军器局的工匠被整批俘虏北上,又从中原‘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余户’。当南京城降后,令招集诸匠,‘一日应募者数千’。太宗时诸王及功臣家还‘争遣使十出

括天下匠’。”但是,从元朝开始,金银器在设计与制作上有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变,从宋代开始的世俗化和商品化又开始逆转,即向上层社会转变。这种转变至明清而不废。如定陵中出土的金器主要有脸盆、漱盂、壶、香盒、粉盒等。从金器上所刻的铭文来看,其大多是内府“银作局”所制。而至清代,皇家金银器更甚,有专为皇家营作的官坊养心殿造办处的金玉作,还有各地方督抚所进贡的制品。总而言之,明清金银器制作一改唐宋以来的丰满富丽、清秀典雅和意趣恬淡的风格,而趋于华丽、浓艳的宫廷气息。

元明清时期,在金银器的制作方面,官府有专门的作坊,民间也出现了一些“治金”“治银”的名家高手,如朱碧山、闻宣、谢君羽等。这些民间金银制作名匠的出现,也体现了元明清3代金银器物制作的繁荣。当然,在宋元明清的几个朝代中,金银除了用于制作器物外,也大量作为货币来使用,尤其是白银货币得到了普遍流行。

4 结语

纵观中国古代金银器物设计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金银器物的发展是逐步从小件饰品向器皿演变的,与其它的设计艺术相比,独具特色并在古代设计艺术中形成了独立的造物体系。中国古代金银器物设计的发展表明,金银器物设计是历史语言的延续,同时也是不同文化及各种设计艺术横向渗透和影响下的产物。中国古代金银器物设计艺术的发展过程,既是对每个时代不同艺术特色的展示,同时也是对每个时代不同的审美意识和精神风貌的反映。中国古代金银器物设计艺术在本土文化艺术的影响下产生并发展;同时,在吸收域外设计艺术的情况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成为了中国古代设计艺术中的一枝奇葩。

参考文献:

- [1]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C]//文物编辑委员会.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9: 139-153.
Gansu Museum. Gansu Province Archeological Work for Thirty Years [C]//Heritage Editorial Board. Archeological Work for Thirty Years. Beijing: Cultural Relic Press, 1979: 139-153.
- [2] 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375.
Sun Ji. Han Dynasty Material Culture Material Illustrations [M]. Beijing: Cultural Relic Press, 1991: 375.

(下转第67页)